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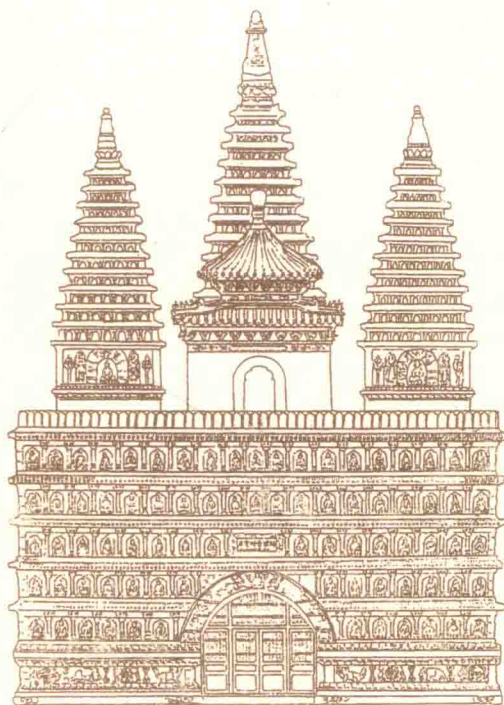
ཨོ།། བོ་ཅིང་གི་ཐོད་བརྒྱན་ནང་བསྟན་གྱི་སྒྲུ་རྩལ།།

ཡོན་མིང་ཚིང་རྒྱལ་རབས་དུས་ཀྱི་བོ་ཅིང་ཐོད་བརྒྱན་ནང་བསྟན་སྐོར་གྱི་རིག་དངོས་དང་གནའ་ཤུལ་ཞིབ་འཇུག།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明)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明)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本书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2013年度规划项目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七至十三世纪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14ZD011)前期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明 /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主编. — 北京：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300-0336-7

I. ①北… II. ①谢… ②魏… ③贾… III. ①喇嘛宗
—宗教艺术—历史文物—研究—北京市—明代 IV.

① K872.104 ②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3994 号

出版人：曲 仲
项目监制：安 东 吕克农
项目统筹：张秋跃
特约编审：黄维忠
责任编辑：张秋跃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罗 瑞 李 芸
书籍制作：红黄蓝设计中心
责任印制：宋 超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明)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BEIJING ZANGCHUAN-FOJIAO YISHU

谢继胜 魏 文 贾维维 主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8

印 张 105.5

字 数 7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0-0336-7

定 价 2980.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编委会

主 编 谢继胜 魏 文 贾维维

撰 文 谢继胜 熊文彬 廖 旸 罗文华

魏 文 贾维维 李 俊 王 微

闫 雪 郭丽平 孙 琳 杨鸿蛟

孟 丽 谷新春 周玉州

图片摄影 谢继胜 魏 文 等

图片统筹 孟 丽



护国能仁：

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



元代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藏传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原。明承元制，吸收元廷在治理西藏方面的成功经验，并进一步向前推进，改“独崇萨迦”为“多封众建”，仅永乐帝在位期间就分封了八大教王：三法王（大宝、大乘、大慈）、五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包含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可以反映出永乐帝推行多封众建的宗教政策的积极性与决心。有明一代，为了大力发展藏传佛教，稳定对西藏的统治，历朝皇帝几乎都支持藏传佛教，不仅延请大量藏传佛教高僧在北京传播藏传佛教，而且还在宫阙之内与京都两城之地，大兴土木，一时间藏传佛教寺院遍布京畿。

据明代沈榜《苑署杂记》所记，京畿之地，两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寺、观、庵、宫、庙共有五百六十八处，每处均记有名称、位置、建寺时间以及规模等。藏传佛教寺院在其中就占了相当大比重，城内有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兴教寺、弘仁寺、智化寺、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等，城外亦有西域寺、西域双林寺、西竺寺、大觉寺、法海寺、潭柘寺、圆通寺等等。这些寺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代皇帝除世宗佞道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永乐皇帝即位伊始，即遣使入藏延请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哈立麻入京（即今南京），在灵谷寺建普渡大斋超度明太祖及其皇后，永乐八年（1410）敕令以蔡巴甘珠尔为底本刊印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刻本藏文大藏经，永乐十二年（1414）又遣使赴藏延请格鲁派领袖宗喀巴入朝，其弟子释迦也失代师进京，在内地主持了朝廷和各大寺院的众多法事活动。宣德以后的历代皇帝又在北京陆续修建了大护国寺、大能仁寺等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供养留京藏僧亦多至数千人之巨。往来于内地和西藏之间的僧人、使者和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川流不息。

甘肃的岷州、河州和洮州地区在明初的西藏和内地之间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和交通位置。从洪武开始，明朝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重要的措施来维持明朝在西藏和西北藏区的统治，以及沟通西藏和内地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一些杰出人才就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敕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大通法王智光和大善法王沙加等都是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频繁来往于汉藏两地，个人活动带动了两地文化的共同发展。

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宫廷艺术和寺院艺术两个方面，其基本面貌也随着汉藏两族愈见深入的交流而不断演变发展。

永宣时期造像无疑是明代宫廷艺术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项，其风格的形成与西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元代起，在政府的主导下，汉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藏地艺术创作的灵感，同时，西藏的艺术家还借鉴尼泊尔艺术家的造型手段，西藏的塑铸工艺水平亦大幅度提高，出现了金铜造像创作的高潮。萨迦寺集会大殿的金铜造像，夏鲁寺、丹萨替风格的造像对汉地的金属造像和雕塑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永乐宣德时期的金铜造像就是这种风格演进的结果。

明代初期，北京地区还创作了大量的宗教作品，其中蕴含的艺术性引人注目。以唐卡为例，从图像和风格上来看，散落在各大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永乐、成化和正德款唐卡在与西藏本土藏传佛教艺术保持同步的基础上，也开始逐步出现了自觉性的蜕变。永宣时期之前的作品都保留了浓郁的藏式风味，其后的作品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汉式艺术因素，藏式艺术因素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这种改变也出现在同时期的佛教版画作品中。此外，宫廷罗汉唐卡样式也对藏区的罗汉画像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的藏传佛教及艺术在京畿之地和汉藏交界地区广泛传播，上至天子皇妃，下至王公贵胄，都热衷于藏传密法，这也促进了西藏艺术及装饰遍布各地。明代北京新建或重修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载体，寺院的形制也趋于统一，基本沿袭汉地“伽蓝七堂”中轴式布局并在建筑和绘塑作品上呈现藏式面貌，大觉寺、智化寺、真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内的雕塑与汉地的塑像有明显差异，与永宣时期的金铜造像基本保持风格上的一致，都带有明显的藏式因素。

15世纪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北京、西藏本土、内地其他地区在继承前代佛教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均在这一世纪里逐渐显现出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的艺术风格，艺术家一方面继承本土传统艺术的精髓，另一方面对其他风格进行批判性地接受、创造性地改造，各种地域性艺术风格在15世纪并行发展。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在与藏区文化频繁接触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汉藏艺术由此开始步入黄金时代。



第一章

明代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艺术（上）

第一节 大隆善寺相关史事

大隆善寺为明代北京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其鼎盛时期，规模之大，蔚为巨刹，与同期的大能仁寺、大慈恩寺并称为京城三大藏传佛教寺院。一时间，众多汉藏僧人聚集于此，拜经求佛，其中更不乏一些高僧大德。明朝皇室出于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目的，曾对大隆善寺这些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高僧们大加礼遇，不仅封授大量财物，还加赐法王、佛子、禅师、大国师、国师等封号，既肯定其在京师的宗教地位，又予其极高的社会荣誉。在这种浓厚的政治与宗教氛围中，大隆善寺内曾频繁地举行一系列诸如修习、传法、译经、建塔等宗教活动，又进一步促进了大隆善寺威望的提高，在整个明代均声名远扬，香火甚旺，大隆善寺亦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可惜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京城大寺，由于历史和人为等原因，现今已衰败寥落，以至无人问津，只能诉求于一些正史与笔记来梳理大隆善寺的发展史。

一、文献中大隆善寺的发展史

（一）元——寺之始建

大隆善寺初名崇国寺。旧时有南北崇国寺之称，实际上，南寺在元初已毁于战火。据《日下旧闻考》引《燕云录》所云，宋靖康二年（1127），陈过庭使金，“自真定遣至燕山崇国寺安泊”，¹可知崇国南寺为金初旧刹，可金以前的状况暂无可考。金、元之际，此寺与悯忠寺同毁于战事之中，事定之后，耶律楚材疏请僧善选住持悯忠寺，并寻访崇国旧迹。²但是僧定演却在大都重新择地建寺，时称崇国北寺。本节探讨的崇国寺即此北寺。

元朝建立以后，统治者特别崇奉藏传佛教，大都成为主要基地。大力修建藏传佛教寺院、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尊崇佛僧，这些举措无疑都对藏传佛教在大都的传播起到强力的推动作用。崇国寺即在这种政策下应运而生。

据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赵孟頫所撰《佛性圆

融崇教大师演公碑》，以及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此寺原名崇国寺，由僧人定演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前后在大都建寺，可以视为本寺滥觞之始。³定演俗姓王，七岁入崇国寺，师从崇国寺隆安和尚，隆安曾“付以传明之任”，“研精圆顿教旨”。⁴隆安和尚辞世之后，崇国寺住持之位虚席，定演遂接管，一时间学徒大集。因其训释孜孜，忽必烈对他甚是嘉许，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另据史料和寺内部分碑文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左右，别赐地于大都，令定演连同门人建大崇国寺，“作大殿以像三圣，树高阁以度诸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当时有“宿德雄辩大师”之称者“授之以金书戒经”，“于是祝发之徒以万计，咸稽首座下，尊礼师为羯磨首”。⁵僧定演主持修建崇国寺期间，讲经布法，日讲《华严经》，并且寺内有赵孟頫书写的寺碑，可见崇国寺在建成之初就已享有一定声誉。元皇庆、延祐年间，仁宗、皇后又赐钞三千余锭，“买地别建三门”，“寿元皇太后复赐钞五百锭而经营焉”。⁶延祐二年（1315），中书省参政速安及子曲迷夫不花于千佛殿后施建舍利塔。顺帝至正五年（1345），僧智学等又“重修法堂、云堂及祖师、伽蓝二堂，与厨库、僧房、侍者漱房五十余间。复新建钟楼、法堂东廊庑、南方丈等三十余间”，⁷寺历时六年告成。从以上史料记载的寺内的殿宇堂室情况来看，崇国寺在元代已经初具规模了。

（二）明——发展鼎盛期

有明一代，朝廷继续推崇藏传佛教，并吸取元朝独崇萨迦派的教训，实行“多封众建”的宗教政策。北京作为明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继续成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舞台，也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除了世宗佞道外，几乎各朝帝王、后妃均有新建、重修、重建寺庙的举措。⁸大隆善寺作为当时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历经几番增修改建，受到皇室的高度重视。见于史料记载的规模较大的两次重建与更名在明代宣德、成化两朝。

宣德年间，北京佛教呈现出兴盛景象。明宣宗尤其崇信印度密教和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密教僧人，举办法事。宣德四年（1429），崇国寺得到第一次大规模的重建。宣宗“奉佛敬僧，将厢殿一座数十余间，修盖佛殿、僧房”，⁹并改称为大隆善寺。《安多政教史》也记载：“在火羊年¹⁰……大隆善寺，由国库拨款重新维修佛殿，并新建佛殿的殿顶和连接的两廊、寝宫以及比丘们的住房僧寮，共有五百余间房舍。”¹¹事实上，宣德年间的此次重修是与迎请藏族高僧班丹扎释有直接关联的。班丹扎释自永乐初年首次进京（南京）之后，即备受明朝皇室的器重与礼遇，洪熙元年（1425）被加封为“净觉慈济大国师”之后，宣德元年（1426），宣宗又“金章宝诰，特宠之吁”。宣德四年（1429）将班丹扎释所居崇国寺赐名“大隆善寺”，宣宗又于宣德十年（1435）再次敕修大隆善寺，进一步加以修缮，“师所居丈室遂撤，而立新之”，¹²令大国师久居其室。大隆善寺似乎因为这位西天佛子大国师的住锡迎来了其首个发展鼎盛期。

崇国寺经宣德时期重建并改额大隆善寺后，至成化元年（1465），“历岁兹久，新者复弊”。宪宗对佛教极度崇信，不仅在即位之初便召藏僧入宫诵经，更是“亲习西番梵呗，与番僧辈演唱于禁中”。大量重建、重修寺院也是宪宗崇佛的一个重要表现，据粗略统计，成化年间修建的寺院竟多达六十余所（其中包括新建、重建与修建的寺院）。在这种浓厚的崇佛氛围中，成化七年（1471），宪宗“出内帑金帛，市材僦工，鼎新缔构，逾年而工告成。规模宏壮，差胜于昔，因增其额曰大隆善护国寺”，¹³并称赞佛教说：“佛氏之道，肇自西土，达于中国，以慈悲为心，利济为教，而化民趋善，尤为切至。是以时君世主，往往信向而崇奉之，为其道广大而有补于世也。”¹⁴在《护国寺题名碑阴记文》¹⁵中，宪宗又说：“朕念佛地，乃出帑金，募财结缘，以成胜事。命太监二员黄顺、覃勤谨率监督内官杜监等十三员，及侍郎等官蒯祥等，各色巧匠千数余人，

自成化七年九月初八日兴工,次年十一月初二毕工。”对该寺的修建,从太后、皇后、皇妃乃至宫女、宫人、太监等无不捐资相助:“大明成化七年,皇帝重新修建大隆善护国寺,钦奉圣母皇太后助赐金帛,及中宫并各宫皇妃,下至女官、宫人等亦各乐助银币等物,自本年九月初八日兴工,至次年十一月初二毕功”;¹⁶“内侍太监等臣钦惟皇上至善深仁,发乎圣心,不胜欢跃,亦各乐助私财,共成胜事”。¹⁷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寺内一通藏文碑文,即正德七年(1512)的《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大致曰:“成化八年(1473)复加修整,(将寺名)加‘护国’二字,即为今之‘大隆善护国寺’。”[chong hā lo chu mo vgug (lug) dus/ rgyal povi yab mos slar…zhig gsos gi rje nas/ hwu guvi yig ge gnyis ka bsnon ba dang/ da lta tavi lung shen hwuvi guvi gsi ming ba yin/]¹⁸

朝廷每年都会为大隆善寺提供一定数量的藏经,下令要每月捐舍白金对寺院“营备供养”,命众僧在大隆善寺内敷设坛场,虔心看念诵经。并且规定从成化十二年(1476)开始,每年的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二日,都要在寺内修设水陆大会、看诵大藏真经三昼夜,以求佑国保民。¹⁹

另外,据《帝京景物略》载:“正德壬申(1512)敕西番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大觉法王着肖藏卜等居此,寺则大作。”正德年间,两位法王同时入住大隆善寺,为表示重视和尊崇,明朝廷下敕谕,对大隆善寺大加修缮,并大规模扩建。一方面反映了明廷对藏地法王的重视;另一方面两位法王的住锡也使大隆善寺的声望和寺宇规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事实上,除了朝廷下旨出资修缮大隆善寺以示恩宠,予其极高的社会与宗教地位外,众多汉藏高僧在大隆善寺开展频繁的宗教活动,更是促进了此寺声望的提高。明代北京较为著名的藏传寺庙,如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兴教寺、真觉寺等,均曾留居大量的藏族僧人,但其中馆留藏僧最多的,当数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和大慈恩寺这三大寺。当时,

北京有一些名僧、高僧被皇室招觐入朝之后,便馆于京师寺庙。永乐及宣德两朝,特别是迁都北京之后,留驻京师的藏僧越来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以至明廷终下旨裁减在京番僧。宣德十年(1435),宣宗下旨“凡事俱从减省”,胡濙等提议“在京各寺法王、国师、刺麻六百九十余名,减数存留,余者令回原寺住坐”。²⁰至正统元年(1436),胡濙等人再奏,“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²¹当时这几座较为著名的藏传寺院馆留僧人的数量可见一斑。汉藏高僧均曾驻锡于大隆善寺。例如,华严名僧法主慧进曾被“待以国老”,“诏于内翰因多官并僧众对写金字《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尚膳供饌”。其后,他在大隆善寺开讲《楞严会解》,“听受缙素万余指”。²²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宣宗“敕修大隆善寺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²³备受礼遇。藏僧绰巴札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其至京师,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²⁴宣德九年(1434),僧雨庵祖渊自天童寺被召入北京。祖渊念禅、讲、教三宗“名不可不正”,宣宗奏准以大功德寺、大慈恩寺、大隆善寺三寺分别为之,“由是三宗弟子各有依归,传道受业,而纲绪始无紊乱矣”。²⁵众多汉藏高僧大德在大隆善寺开讲布法,一方面加强了藏传佛教在京师的传播,促进藏汉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隆善寺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藏传寺院在明代京都的地位。

明廷不仅重修改建大隆善寺、馆留众多藏僧,出于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目的,还封授他们大量财物,并且加赐大量大隆善寺的藏族高僧,以示恩宠。几乎各朝均有加赐法王、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僧纲等封号的记录,既肯定其在北京崇高的宗教地位,又给予其极高的社会荣誉。其中尤以成化、正德两朝最盛,现择要记之:

成化十五年闰十月丙子(1479.12.7):太监李

荣传奉圣旨：……大慈恩寺国师乳奴班丹为灌顶大国师，觉义绰吉坚参为国师；大隆善护国寺灌顶大国师班卓儿藏卜为佛子，国师著札领占为灌顶国师。²⁶

成化十七年十月戊辰（1481.11.18）：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班卓藏卜死，命摘官军一千五百为建塔治葬。²⁷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戊申（1481.12.28）：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大隆善护国寺禅师札石竹为国师，刺麻班卓札失右觉义、锁南伦竹都纲。²⁸

成化十九年正月辛酉（1483.3.6）：赐大隆善护国寺国师锁南坚剏诰命。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能仁寺灌顶大国师结斡锁占为佛子。²⁹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1484.11.20）：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剏、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俱为法王，大隆善护国寺灌顶大国师著札领占朵儿只巴西天大佛子，大慈恩寺国师绰吉坚参灌顶大国师，……大隆善护国寺刺麻端竹罗卓、觉义僧戒增左[右]觉义，大能仁寺觉义领占竹讲经，都纲锁巴列、公葛栓刺、结思念俱觉义，……³⁰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1485.1.22）：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九事：“……一、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护国三寺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廩饩、膳夫供应不足。况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用度拟于王者，而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宜令给事中、御史核其本出山[西]番簇者，听其去留，冒滥者悉令还俗。……”³¹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庚戌（1486.4.8）：太监韦泰传奉圣旨：……永安寺住持僧宗铨升左觉义，大隆善护国寺禅师班麻扎失升灌顶大国师，觉义端竹罗卓升禅师，刺麻竹麻札失、星吉班丹、汪秀坚剏俱升都纲。³²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486.11.4）：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刺星吉、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著札领占朵而只巴为法王。³³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壬午（1487.5.5）：陕西岷州

大隆善护国寺国师番僧绰肖藏卜等、陕西拱卜寺番僧札六等各来朝，贡马及佛像、舍利等物。赐彩段、绢、钞有差。³⁴

弘治十二年六月丙辰（1499.8.4）：升大隆善护国寺国师著札领占为西天佛子，命所司给应用衣物。从其请也。³⁵

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巳（1502.1.21）：传旨升大隆善护国寺梁[朵]而只也[巴]为两[西]天弗[佛]子。³⁶

正德二年三月癸亥（1507.5.1）：太监李荣传旨：大慈恩寺禅师领占竹升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禅师的室哩塔而麻穆耶那卜坚参、大隆善护国寺禅师著肖藏卜俱升国师，给予诰命；大功德寺住持方绅升僧录司右觉义管事，仍兼本寺住持。³⁷

正德四年八月癸亥（1509.8.18）：司礼监传旨：升大隆善护国寺著肖藏卜为法王，刺麻罗竹班卓、班丹端竹、班卓罗竹、朵而只坚参俱为左觉义。³⁸

正德五年四月戊戌（1510.5.20）：升大能仁寺国师那卜坚参、禅师札巴藏播为法王，都纲那卜领占为佛子，公葛端竹、坚挫扎失为禅师，大隆善护国寺刺麻绰即罗竹为佛子，大慈恩寺国师乳奴领占为西天佛子。革职国师拾[舍]刺扎为佛子，刺麻也舍窝为禅师。³⁹

正德五年六月壬辰（1510.7.13）：升大隆善护国寺禅师星吉班丹为国师，左觉义罗竹班卓等为禅师，刺麻札竹为左觉义，三竹舍刺为右觉义，伦竹坚参为都纲；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领占、舍刺扎俱为法王，刺麻舍列星吉（为）佛子，也失短竹为禅师；大能仁寺刺麻领占播为都纲。⁴⁰

正德五年七月己卯（1510.8.29）：令大隆善护国寺国师星吉班丹、禅师班卓罗竹俱升佛子，禅师罗竹班卓、班丹端竹、朵而只坚参升国师，大慈恩寺乳奴星吉、领占罗竹升禅师，真觉寺刺麻牟尼星曷升右觉义，的竹了[革]革[了]升国师。⁴¹

正德八年二月辛亥（1513.3.18）：大隆善护国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等谋往陕西洮、临、巩、岷等处设熬广茶而还，因献驼马求赏。礼部执奏无例，

诏特给之。⁴²

……

从明史中记载的这些藏僧受封的记录来看，第一，从时间上来看，大隆善寺的僧众受封记录非常频繁，长则间隔两三年，短则只有月余。例如，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刚敕封班卓儿藏卜为佛子，十二月份又授予金印以示恩宠；正德五年（1510）也是封赐的高峰年，明朝皇帝分别在四月、六月和七月为星吉班丹、班丹端竹等众多大隆善寺的藏僧

加封名号。第二，从数量上来看，除个别专门为某个藏僧加赐的记录外，明朝廷每次的加封记录均为数不少，以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为甚，竟多达52人。再者，从这些加封记录来看，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和大慈恩寺这三座当时最为著名的寺院一度出现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的状况，寺中藏僧多次同时受封，数量上也是等量齐观，显见明代这三大藏传寺庙均得到了高度尊崇和充分发展。

大隆善寺主要僧人的受封情况见表2—1：

表2—1 明大隆善寺主要僧人受封情况统计表

藏僧姓名	受封情况	时间	资料来源	注
班丹扎释	僧录司右阐教	永乐		
	净觉慈济大国师	洪熙元年（1425）	《明实录藏族史料》卷一	
	授予贡马及方物	宣德元年（1426）	《明实录藏族史料》卷一	
	西天佛子大国师	明英宗	《明英宗实录》	
	大智法王	景泰三年（1452）	《明代宗实录》卷222	
班卓儿藏卜	清心戒行国师	正统十年（1445）	《明英宗实录》卷126	
	灌顶清心戒行大国师	景泰四年（1453）	《明代宗实录》卷228	
	国师	天顺元年（1457）	《明英宗实录》卷275	
	灌顶大国师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	《明宪宗实录》卷159	
	佛子	成化十五年闰十月丙子	《明宪宗实录》卷196	
	授金印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	《明宪宗实录》卷198	
沙加	佑善禅师	宣德二年（1427）	诏书	详见下文
	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	正统十年（1445）	《明英宗实录》卷126	
	西天佛子大国师	景泰四年（1453）	《明代宗实录》卷228	
	大善法王	景泰七年（1456）	《明代宗实录》卷268	
	灌顶大国师	天顺元年（1457）	《明英宗实录》卷275	
札石竹	国师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戊申（1481）	《明宪宗实录》卷222	

续表

藏僧姓名	受封情况	时间	资料来源	注
著胤领占 ⁴³	灌顶大国师	成化十八年九月丁酉 (1482)	《明宪宗实录》卷 232	
	西天大佛子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 (1484)	《明宪宗实录》卷 258	
	法王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 (1486)	《明宪宗实录》卷 283	
领占班丹	大庆法王	正德五年(1515)	《明武宗实录》卷 64、97	或为武宗 自封 ⁴⁴
班麻札实	灌顶大国师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1486)	《明宪宗实录》卷 276	
著肖藏卜	贡马及佛像、舍利等物。赐彩段、绢、钞有差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壬午 (1487)	《明实录藏族史料》卷 2	
	国师	正德四年八月癸亥(1509)	《明实录藏族史料》卷 2	
	大觉法王	正德四年八月癸亥(1509)	《明武宗实录》卷 53, 《帝京景物略》卷 1	传奉封授
星吉班丹	都纲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1486)	《明宪宗实录》卷 276	
	国师	正德五年六月壬辰(1510)	《明武宗实录》卷 64	
	佛子	正德五年七月乙卯(1510)	《明武宗实录》卷 65	
	大善法王	正德中	《明武宗实录》卷 125	
班麻札失	觉义	成化十八年九月丁酉 (1482)	《明宪宗实录》卷 232	
	灌顶大国师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1486)	《明宪宗实录》卷 276	
	佛子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戊戌 (1486)	《明宪宗实录》卷 283	

明代历朝共封授法王 13 位,⁴⁵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仅曾经住锡大隆善寺的藏族高僧, 就有法王五位(分别为大智法王, 二位大善法王, 大庆法王和大觉法王), 无特殊称号法王一位。实际上除藏族僧人外, 大隆善寺还先后馆留过大量来自汉地僧人, 以及印度、蒙古的僧人, 其中不乏具有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等封号的高僧大德。朝廷安排众多高僧住持此地, 一方面出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 借大隆善寺

当时的盛誉以礼遇众藏族高僧; 另一方面这些藏僧当时崇高的地位和住持期间举办的修习、传法、译经、建塔等一系列宗教活动又进一步促进了大隆善寺威望的提高。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大隆善寺声名远扬, 香火甚旺。

大隆善寺在明代不仅作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产生重要的宗教影响, 而且曾发挥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 明代的僧录司就曾设于此寺。明朝各级僧官

不置署，僧录司直接设在寺院之内。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为了强化对寺院僧尼的管制，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管全国僧尼寺院，洪武四年（1372）即废止。洪武五年（1373），改为僧度牒。洪武十五年（1383），始在京都设置僧录司。嘉靖九年（1530），僧录司曾建于北京大兴隆寺内。嘉靖十四年（1535）大兴隆寺遭遇火灾，僧录司遂迁至大隆善寺内，接管全国僧尼事务。⁴⁶此后明代僧录司的衙署一直设在大隆善寺内，直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搬迁到正法寺。僧录司下设有善世、阐教、讲经及觉义等僧职，官员级别虽不是很高，但权力很大，执掌中央与地方的宗教事务。大通法王智光在太宗时曾先后任职僧录司右阐教和右善世，始居南京天京寺，永乐十五年（1417）被召至北京，俾居崇国寺，直到洪熙元年仁宗扩建大能仁寺之后，才离开崇国寺转居大能仁寺。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早在永乐时期就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备受重用。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在武英殿召见第五次出使乌斯藏归来的班丹扎释，除赐封号“净觉慈济大国师”外，又令其居于大隆善寺内。此后30年，班丹扎释一直居住在该寺，主持宗教活动并处理僧录司衙署的行政事务。其他藏族高僧如领占扎巴、端竹坚参等人也曾相继在僧录司中担任觉义、善世等职。

明嘉靖以后，大隆善寺仿佛慢慢褪去了京城佛教大寺的光芒，⁴⁷这与世宗抑佛的举动息息相关。尽管穆宗以后，又有诸帝继续崇奉藏传佛教，但是，一方面鉴于前朝极度崇佛之弊，另一方面国事烦扰、财政见绌，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广度与力度与前朝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大背景下，大隆善寺也相应地进入了几十年的沉寂期。

（三）清、民国——衰落期

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大隆善寺在明末的发展状况不甚明了。有幸的是，寺内一通藏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寺史碑》（*rGyal pos bzhengs pavi gtsug lag khang tavi lung gshen hu govi bsivi rgyal khams skyobs*

pavi dge ba dar rgyas gling gi gtsug lag khang rnam thar rdo ring）⁴⁸提供了该寺在清初顺治年间曾被修缮的情况。碑文立于顺治九年（1652），主要叙述了清廷在顺治九年集资修缮大隆善护国寺，使古寺重光，继续利益众生的史事。碑文主体内容是对寺僧提出了苛严的戒律，要求僧众在操守方面自我约束。立碑目的似在整顿寺风。

时至康熙朝，大隆善寺再次更名。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蒙古王公贝勒在此为圣祖祝寿，曾对寺庙大加修葺，并将寺名更改为护国寺。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亲撰《御制崇国寺碑》，⁴⁹赞扬诸蒙古王公藉出资修缮护国寺而祈福的诚意，并表彰了诸蒙古部在平定准噶尔侵藏事件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根据寺内藏文碑《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寺史碑》所记，顺治九年（1652）曾集资修缮大隆善寺，修缮寺墙以及寺内的供物，使此寺大放异彩。碑文涉及了许多藏区佛教以及一般佛教的理论，要求寺僧严守戒律，用心学习经藏，并宣扬了宗喀巴的佛教理论。⁵⁰该寺的藏文名字：东方大须弥福寿寺遍胜洲（*Shar bavi chos grwa chen po bkra shis lhun po phyogs thams cad las rnam par rgyal bavi gling*）。⁵¹

寺内还存有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护国寺诗》，描述了乾隆帝幸临该寺时见到的景致：

护国祇园已有年，胜迹灵踪传日下。谁知今日梵王宇，乃是前元丞相舍。⁵²我屡经过未临顾，问古寻诗其可罢。初冬清蹕移御园，道便琳宫一停驾。重扃狩有开明守，曲砌明争越绫砑。森然乔木荫玉墀，纷若丰碑傍云榭。天人帝释各殊相，或喜而断怒而咤。夜摩兜率六欲天，其次修罗鬼王伯。能仁端居乃无为，信有三摩司造化。试思舍宅福何在，墨胎翁姬相看乍。幞头风帽易旧装，只博腐儒相奖借。道同岂必系衣冠，雀弁黄收异周夏。北魏金辽率殷鉴，谬云复古罪无赦。当年燮理责难辞，翁而有知首肯谢。甲第潭潭富且宏，周览规模增感讶。隔街燕国有赐居，其门如水才三架。⁵³

此外，根据《城西访古记》和刘敦桢于民国时

期的实地考察记载，寺中炉、磬、云板的题记，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道光二十七年（1847）、同治五年（1866）数种，虽然清代修理记录见于碑碣的，只有顺治、康熙两朝，但是这些炉、磬、云板之题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与此寺的丝缕联系。寺内一直留驻许多汉、藏僧人，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85）才主要为蒙古喇嘛所居。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三日，护国寺喇嘛李世斌等因烧香后睡歇，不料香火未尽燃及佛龕，进而引起大火，共烧毁僧房六间！

大概自清乾隆年间起，护国寺逐渐成为一处重要的庙会的场所，这与该寺频繁的宗教活动是分不开的。庙会在寺庙的宗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并附设一些商业活动，久而久之，宗教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庙会逐渐繁盛。自清代延至民国时期，护国寺庙会一直享有盛誉，农历每月逢初七、初八、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日均开庙有庙市，非常兴旺。《燕京岁时记》载：“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之内一大市会也。”⁵⁴20世纪20年代，护国寺又遭火灾，后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东西耳房各二间全毁。约在20世纪50年代，护国寺已经“没有了喇嘛，大庙山门已改成了写字楼，天王殿也改建成了天时宾馆，延寿殿成了清洁队，崇寿殿成了

煤铺，千佛殿成了电影院，护法殿成了护国寺小学校，功课殿成了铁工厂，菩萨殿住进居民，东西两侧的廊房也住进了100多户居民。早年护国寺的建筑布局是十分讲究的，各层殿宇之间保持有20米至30米的距离，中轴线同两侧配殿、廊庑之间保持有10米至20米的距离。自从进驻殿宇的主人发生变化之后，这些人便各自在自己的房前扩大地盘、廊庑之外各自圈进5米至8米左右的空间，开始是建小厨房、储存屋，以后又改造成简易住房，一两间廊庑之前，圈成一个小院。”⁵⁵20世纪70年代，明清之际名冠京师的护国寺仅存正殿金刚殿和配殿地藏殿，2004年的又一场火灾使得地藏殿也付之一炬。而今日的护国寺隐匿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北护国寺街内，仅存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及垂花门后一层殿，⁵⁶历经近八百年历史沧桑尽显寥落，令人扼腕兴嗟。

【图1-1-1 大隆善护国寺现存金刚殿】【图1-1-2 今日大隆善护国寺】

二、明大隆善寺的形制

作为元、明时期京都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历经元、明、清三代，大隆善寺到清朝时已发展成为具有九进十三殿的大寺。该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具体形制在刘敦桢考察报告和《城西访古记》中均有实地考察记录和详细介绍。刘敦桢所绘民国时期护国寺的平面图，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但是大隆善寺在清代也经历过修缮，明大隆善寺的真实



图 1-1-1 大隆善护国寺现存金刚殿



图 1-1-2 今日大隆善护国寺